

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

胡可先

(浙江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文学史上的中古时期指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利用新出土文献研究中古文学,有助于重新审视各个时段的文学背景、文学演变、文学主体以及文体形态,纠正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偏重线性梳理的缺失。首先,出土文献对于扭转区域文学史研究的薄弱局面具有重要作用;其次,通过出土文献可以发掘被历史掩埋的一些文学史现象;再次,出土文献对于文章学研究意义重大,尤其能够促进应用文为主的文体形态研究的深入。但因出土文献的发现具有偶然性和零星散乱的特点,故研究过程中应该与传世文献比照参证,在对出土文献文本复原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的社会文化学观照,以揭示文学生成与发展的原生状态。

[关键词] 出土文献; 北朝文学; 中古文学; 唐代文学; 文学主体; 文体形态; 文学背景

Unearthed Documents 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Hu Kexi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are known as the middle ancient ag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newly unearthed documents will contribute to a reexamination of literary background, literary evolution, literary ontology and stylistic form of these dynasties to correct the traditional heavy reliance in literary history on longitudinal combing. First, unearthed docume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research on regional literary history to regain the initiative. Second, the research on unearthed documents is helpful to probe into the literary phenomena buried by history. Third, unearthed documents are significant for the research of essay, especially for the further study on stylistic forms dominated by practical writing. Because unearthed documents are excavated in odds and ends by accident, they should be compared with historical recordation in study.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of social-cultural science, based on the restoration of unearthed texts, will thus shed light on the natural process of birth and growth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unearthed documents; literature of Northern Dynasty;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ture of Tang Dynasty; literary ontology; stylistic form; literary background

[收稿日期] 2011-08-08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1-10-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ZW029);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011JD03)

[作者简介] 胡可先,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时代划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文学史的中古时期,或指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或指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本文以后者为界定的时段。就中国书写文献的发展来说,汉代是纸简替代的时代,宋代是印刷繁盛的时代。在汉代以前,时代的久远和书写方式的艰难给文学的独立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尽管 20 世纪出土的简帛文书颇为丰富,但其重点是落在学术史而非文学史研究方面;宋代以后因为书刊印刷的兴盛,大量的文献得以广泛流传,因而出土文献对于文学史研究的利用价值相对而言就大为减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是抄本文献占主流地位的时代,尤其是唐代,为纸抄文献流传最广的时代。由于抄本文献辗转易误,以及流传中容易散佚的特点,利用新出土文献进行中古文学的研究,对于探索文学史的原生状态,挖掘被历史掩埋的文学史现象,纠正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偏重线性梳理的缺失,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20 世纪以来,中古时期的出土文献呈现出极为繁盛的局面。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种类较多,有碑刻,有墓志,也有各类造像的题字,还有一些遗址如长沙窑出土的唐诗等^①。这些出土文献以墓志最为大宗,且很大一部分得到了整理,整理的类型主要有五种:一是拓片的汇集影印,如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千唐志斋藏志》、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二是录文的汇编,如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等;三是拓片影印与录文汇编融为一体,如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出土墓志》系列、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洛阳新获墓志》和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等;四是拓片影印、录文汇编和考证诠释结合刊印,如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线装书局出版的《隋代墓志铭汇考》、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等;五是拓片精品的单独出版,如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新出土名家书迹》系列、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近年新出历代碑志精选系列》、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珍稀碑帖丛书》等。这样较大规模的整理为中古时期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利用这些已具整理规模的出土文献,进而追踪未经整理的出土文献,以此研究中古时期的文学,既是重要的契机,也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一

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一直呈现不平衡的局面,长期以来,重视南朝而忽略北朝,谈到北朝文学,也仅仅注意南朝入北的庾信、王褒等人的诗赋和《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等为数不多的散文。即使是目前广为全国高校使用的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将北朝文学置于隶属地位而非主流文学,有关章节是这样处理的:第七章“庾信与南朝文风的北渐”,其中第一节,“北朝文化与文学”,第二节,“南北文风的交融”,第三节,“庾信文章老更成”。这样,整个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北朝文学。

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公布,出现了与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常规反差较大的现象,这就是新出土的墓志中,虽南朝和北朝都有,但北朝墓志的数量远远超过南朝。有关魏晋南北朝墓志的著录和释文汇编著作目前已有多部出版问世,如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王壮弘、马成名《六朝墓志检

^① 20 世纪以来,敦煌吐鲁番出土了大量的写本文献,其中很多是文学价值很高的各类写本,因为敦煌吐鲁番研究已成为专门的学问,加以本文为论题集中起见,一般不涉及新出土写本文献的内容。

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①。从这些著录和释文汇编之作的数量统计就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中南北朝墓志的悬殊(表1)。韩理洲先生近年汇辑的《全北齐北周文补遗》又收录文章939篇，几近清代著名学者严可均所收文章的两倍，其中多数亦来源于出土文献。这样就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北朝文章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依据的第一手文本。

表1 新出土魏晋南北朝墓志数量对照表

书名	魏	西晋	东晋	宋	齐	梁	陈	后燕	北魏	东魏	北齐	西魏	北周	高昌	隋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	2	14	1	1	1				314	44		12			221
六朝墓志检要	11		53	6	3	10	3		382	54	65	3	21		302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	2	21	14	3	1	6	1	1	293	58	82	3	18		34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			魏晋十六国南朝		21				43	23		28			116

注：《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共11卷，前10卷为正编，第11卷为补遗。本表是根据该书正编和补遗所收全部墓志统计。

因为长久以来研究的惯性，除了极少数碑铭如韩愈所撰的《柳子厚墓志铭》以外，大多数墓志是被置于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之外的，故而北朝出土那么多的墓志碑铭却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其实墓志碑铭是很重要的文学体裁，尤其是北朝墓志，对于研究北朝的文学生态与演变是很有作用的。在这方面，陆扬先生的一段论述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墓志的写作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学活动，所以对了解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有特别的帮助。虽然这一时期的墓志，绝大多数都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但我们却依然可以从墓志的写作中观察出一般文学的质量和南北方文学的交互影响，这一点对于北朝文学尤其重要。当代对南北朝文学的研究重点几乎都在南朝，虽然有些像曹道衡这样的优秀学者也将研究的目光转向北朝文学，但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见有哪一种讨论北朝文学的著作将北朝墓志作为其考察的对象，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这无形之中将大批能代表社会精英阶层文学趣味的作品样本弃之不顾。这或许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取向和文学观有关。这种研究仍然过多着眼于所谓的经典性名家名作，而且对于何谓文学采取一种以能否抒发个人情感为标志的现代观念。^{[1]24}

由以上的考察和引证可知，北朝文学史的研究要改变目前薄弱的局面，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工夫：

第一，对于出土文献中的文学文本加以清理。北朝出土文献中的文学文本大致有两种：一是未经面世的文学作品。如1987年出土的《北魏席盛墓志》就是一篇颇具文学色彩的作品：

君讳盛，字石德，安定临泾人也。水帝开其远源，稷君重以大业，迺百世而必祀，历千载而承流。监公遥集文雅，腾华秘阁；天水剖符共治，政成大邦。自时厥后，慕戎无旷。君禀灵秀出，与善俱生，乘道德以立身，体仁义而成性，怀清明之质，抱柔惠之心，行不失准绳，动不逾规矩。是故朝廷谓之俊士，乡里称为善人。学成名立，脱巾应务，释褐殿中将军。高祖兴阪泉之

^①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见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3、第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影印版；王壮弘、马成名编著《六朝墓志检要》，(上海)上海书画社1985年版；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其中除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收有拓本图版外，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及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皆有录文而无原石拓片图版。

俊,誓丹水之师,方欲清尘东国,澄氛南海,君应机效用,执弥戎行。^{[2]97}

这里叙述席盛的家世和生平,以骈文出之,文字上通体属对,工整精密,形式上敷陈藻饰,研炼声韵,文气舒缓而不平滞,辞义通畅而不艰涩。再如《北魏高猛妻元瑛墓志》:

主讳瑛,高祖孝文皇帝之季女,世宗宣武皇帝之母妹。神情恬畅,志识高远,六行允备,四德无违。孝友出于自然,柔恭表于天性。虽倪天为妹,生自深宫,至于箕蒂制用,醴醕程品,非唯酌言往载,而率用过人。加以披图问史,好学罔倦,该柱下之妙说,核七篇之幽旨,驰法轮于金陌,开灵光于宝树。绌穀风靡,斧藻川流,所著辞誄,有闻于世。兰芝之雕篆富丽,远未相拟;曹家之肇悦淹通,将保以匹?及于姿同似月,丽等凝神,虽复邯郸庄容,易阳稚质,无以尚也。爰始相攸,事归髦杰,自地兼齐纪,声高梁魏,则肃雍之车,御轮无主。^{[2]118}

这篇墓志仍以骈体为主,但较《北魏席盛墓志》,则文气承转又有所不同,盖叙事时偶用连词,杂以散句,又间以典实,故华美而不失庄重,整饬而又富变化。以上两篇墓志虽没有标明作者,但从墓主高贵的身份推测,应该是当时著名的文人撰写的。这样的墓志无论从文体意义还是文本意义上说,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对此类墓志文本加以清理,可以梳理出很多珍贵的文学史料。

二是传世千年的文章又得到珍贵的石本加以印证。即以庾信而言,1953年在咸阳张湾出土了《北周步六孤须蜜多墓志铭》,是庾信60岁的作品,2005年又在咸阳北面的古洪读源上出土了《北周宇文显墓志铭》,是庾信61岁的作品。前者拓片藏于北京图书馆,《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有录文^{[3]484-485};后者为新近出土,西安碑林博物馆王其祚、李举纲有专文勘证^[4]。《北周宇文显墓志铭》题款有“开府新野庾信字子山撰”,这在南北朝墓志中是极为少见的,标志着墓志这种文体到了庾信的晚年产生了较大变化。因为早于此一年的《北周步六孤须蜜多墓志铭》尚没有作者的题款,如果不是将新出土文献与集本对照的话,尚难以确定墓志的作者。到了唐代,墓志石本的题款署名署衔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情况,很可能是庾信首开其端的。另外一篇则是1996年宁夏固原县出土的《北周田弘墓志》,这篇墓志虽未署作者,但据罗丰先生考证,确为庾信的作品^①。这三篇墓志的行文都是非常典雅的骈体,《北周步六孤须蜜多墓志铭》有云:

夫人七德含章,四星连曜。敬爱天情,言容礼则。九日登高,乍铭秋菊;三元告始,或颂春书。年十有四,聘于谯国。友其琴瑟,逾恭节义之心;伐其条牧,实秉忧勤之德。邺地登高之锦,自濯江波;平阳采桑之津,躬劳蚕月。天和元年册拜谯国夫人。东武亭之妻,既称有秩;南城侯之妇,还闻受封。柱国殿下以若华分照,增城峻上,杨旌焚道,问政邛都。白狼之溪,途艰黄马之坂;荔支之山,地险蒲陶之国。夫人别离亲戚,关河重阻。夷哥一曲,未足消忧;猿鸣三声,沾衣无已。是以天厉之疾,遂成沉痼。玉沥难开,金膏实远。^{[3]484}

《北周宇文显墓志铭》有云:

即用为帐内大都督、都督沧州诸军事、沧州刺史,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户。黄公衡之快士,魏后是以推心;潘承明之忠壮,吴王为之降礼。异代同荣,见之今日。东夏边隅,地连荒服,井陉塞道,飞狐路断,乃以公为持节、卫将军、都督东夏州圜军、东夏州刺史。白波、青犊之兵,铜马、金绳之乱,莫不交臂屈膝,牵羊抱马。在州遘疾,解任还朝。小马留厩,余床挂柱;吏民叛恋,刊石陞山。虽非汉阳之城,还似扶风之路。^{[4]251}

① 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云:“《田弘墓志》亦属没有题名撰者之例,虽然我们已知《神道碑》为庾信所撰。其后人墓志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确切资料。唐咸通十二年《唐乾干夫人墓志》载:‘夫人其先本姓田氏’。‘十二代祖讳弘,事周有功’。‘义城公庾开府撰墓志及神道碑,具述锡姓之由。《北史》、《周书》备叙勋烈。’这样亦可肯定《墓志》与《神道碑》同为庾信撰写。”(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395页)而陆扬《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认为:“庾信既已撰田弘的神道碑,那么田的墓志铭应该是另一位作者所写。”(《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4期,第121页)陆所论非是。

与集本比较,《北周步六孤须蜜多墓志铭》有37处异文,这些异文大都以石本为优,尤其是两处增字颇多的地方很值得重视:一是“礼也”下石本多出“夫人奉上尽忠,事亲竭孝,进贤有序,逮下有恩。及乎将掩玄泉,言从深夜,内外姻族,俱深节女之悲;三五小星,实有中闺之恋”48字。二是“金阙”下石本多出“太夫人早亡,夫人咸盥之礼,不及如事。至于追葬之日,步从辄途,泥行卅余里,哭泣哀毁,感动亲宾。桂阳之贤妻,空惊里火;成都之孝妇,犹掩江泉。呜呼哀哉”60字。这两处增加的文字,前者以骈为主,后者骈散结合。《北周宇文显墓志铭》的正文,石本就多出122字,而这122字多是散体的叙述,很少骈体的描写。如:“魏武皇帝龙潜蕃邸,躬劳三顾,爰始诏谋,公乃陈当世之事,运将来之策,帝由是感激,遂委心焉。武帝即位,除冠军将军、直阁将军、阁内都督,别封城阳县开国侯。”将石本和集本对比,石本的文字基本是骈散参半的,这也表现了同样一篇文章,当其刻石和收入文集时,因功用差异,而详略有别。刻于石者要遵从墓主人家的意愿,尽量多地叙述墓主的生平经历,而收于集者则要更多地体现当时重骈轻散的潮流,而删去原文中较多的散句。

新发现的《北周田弘墓志》虽然没有集本传世,但墓志和《神道碑》为庾信一人所撰,也可用墓志石本以比照《神道碑》集本的特点。这两篇文字都使用了庾信特有的四六隔句对仗的写法,且弘正典雅,读来颇觉辞情赡丽。如墓志中的一段:

本姓田氏,七族之贵,起于沙麓之崩;五世其昌,基于凤皇之繇。千秋陈父子之道,人主革心;延年议社稷之计,忠臣定策。公以星辰下降,更禀精灵。山岳上升,偏承灵气。淮阴少年,既知习勇;颍川月旦,即许成名。^{[5]373}

《神道碑》则言:

本姓田氏,虞宾在位,基于揖让之风;凤凰于飞,绍于亲贤之国。论其继世之功,则狄城有庙;序其移家之始,则长陵有碑。况复高庙上书,小车而对汉主;聊城祭鸟,长岳而驱燕将。公以胎教之月,岁德在寅;载诞之辰,星精出昴。是以月中生树,童子知言;水上浮瓜,青衿不戏。而受书黄石,意在王者之图;挥剑白猿,心存霸国之用。^{[6]834-835}

但相较而言,收于集本的《神道碑》比之新出土的墓志,不仅同一段叙事运用骈体的文字更多,风格更为典雅,同时碑文多用连词,承接自如,志文工于属对,潜气内转。志和碑述事相同而行文有异,而且墓志在叙述墓主官历和立身行事时用了更多的散句。这种用散句叙述行迹、用骈句评定品行的写法,成为后来隋唐五代墓志的一种常见的方式。

第二,从文体特征和文体渗透的层面,对一些应用文体重新定位。以前的文学史研究重经典性名家名作,轻应用性文字篇章,这在北朝文学史的研究中更为突出。因为北朝的文学作品无论传留于今还是新近出土者,都以应用性文字居多,即以韩理洲所编的《全北齐北周文补遗》而言,其中收录的檄、书、诏、敕、记及大量的碑志,绝大多数是当时的应用文体。而目前的文学史著作所重视者无非是庾信、王褒等人的诗文,以及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酈道元的《水经注》等著作,其实这些名家名作并不能代表北朝文学的全貌,况且他们都是由南入北之人,其作品更不能替代北朝文学的独有特点。故而以新出土文献为基础,就文体特征和文体渗透两个基本层面来考察北朝文学,有助于北朝文学原生状态的展示。

仍就墓志而言,北朝墓志除了志序与铭辞配合这些碑志所共有的文体特征之外,其文风还受到南朝文风的影响逐渐趋于骈骊化,这在由南入北的庾信等人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①。事实上,就北朝墓志文的演进过程来看,是以史传为主的写实文学与以铭辞为主的典雅文学结合的结果。史传

^① 有关北朝墓志文的研究,近年也出现了一些学位论文,如魏宏利《北朝碑志文研究》,西北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赵海利《北朝墓志文献研究》,山东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宋冰《北朝散文研究》,苏州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其中魏宏利之文对于碑志文的总体特征涉及较多,可以参考。

文学自先秦到南北朝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重要著作,这对于传记文学的影响和渗透至关重要,魏晋南北朝的逸事小说《世说新语》自不必说,各种碑铭也是在史传影响下勃兴的。铭辞这种文学体裁也产生很早,它的产生与古代祭祀相关,春秋战国时期的很多青铜器就有铭辞,并已形成一定的格式^①,形式以四句为多,风格典雅古朴,有些还符合音韵节律。春秋战国时期,铭文经历了由金刻到石刻的演变过程,到了秦代,颂功刻石作为文学的重要体裁表现出尚质和实用的特点^②,这是墓志铭文的重要渊源。因为墓志文是一种特殊的文体,要对墓主一生的行迹加以记述,就必须吸取史传文体之优长,又要对其一生功绩加以评价,这就综合了铭辞既铭功颂德又古朴典雅的特点。因而在新出土魏晋南北朝墓志特别是北朝墓志中,经常发现志序和铭辞在字数上是平分秋色的,甚至有些墓志铭辞重于志序的现象,这与后来的墓志文以序文为主、以铭辞为点缀的情况有所不同。因而史传文体与铭辞文体的相互渗透,在北朝墓志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自司马迁以后,史传文也有赞语,但这种赞语与传文相比篇幅极少,与墓志的序文、铭文的关系差异很大,但史传的这种形式应该在墓志文体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一定作用。

第三,由重视经典化名家的研究套路转向文学的经典化与社会化研究并重的研究方向。文学史研究的经典化在北朝文学研究中最为突出,主要在于魏晋南北朝处于文学自觉的时代,而南朝文学在这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故研究北朝文学的学者不得受南朝文学的影响。其结果就是研究北朝文学也就主要注意由南入北的几位重要文学家,以及几部对后世影响巨大的著作,而像北朝的本土作家魏收、邢劭、温子昇等仅仅作为配角在文学史上有所述及。这种研究倾向给人们造成了北朝文学荒漠化的印象。其实,我们放开眼界,视野由经典名家名作扩展到日常生活而进行多元化的思考,北朝文学研究尚具有较大的社会空间。一方面,出土文献提供了北朝文学研究社会化的大量文本载体。尤其是新出土碑志,无论是达官贵人的碑版,还是平民百姓的墓志,根据当时的惯例,绝大多数不书作者,尽管其中也偶有著名文人所作,但因著作权的不确定,我们也不得归于社会化的文学文本之列。另一方面,这些文学作品又属于史传文学的一部分,参以北朝史学较为发达,产生了诸如魏收等著名的史学家,体现了务实的文学风气。这样社会化的文学作品既有异于南朝的绮靡情调,也与由南入北作家的创作有所区别。

二

文学主体主要包括文学家和文学创作两个方面。文学主体的研究要取得重要进展,有赖于新材料的发现和问题的探索。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这一特定的中古时期,新材料的特点是石刻文献和写本文献极为丰富,石刻中的墓志尤其成为新文献的一大宗。这些新的材料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促进文学研究的发展。而相较于本文前一部分论述的出土文献对南北朝文学的影响而言,新出土文献对文学主体的影响在唐代更为显著。我们知道,唐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相关的研究古往今来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有些领域甚至被耕耘过千百度,但随着近年来大量出土文献的问世,以前不被注意的文学现象也被不断地挖掘出来,一些诗人也将被重新定位,从而补充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并推进整个唐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就诗人地位来说,有些诗人在当时具有领袖群伦的地位,但因为其作品的散佚,其声名随着时

① 《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见《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606 页。

② 参见饶宗颐《论战国文学》五《金石刻辞二者的消长》，见《文辙：文学史论集》上册，（台北）学生书局 1991 年版，第 215 - 219 页。

代的推移而逐渐埋没,新出土文献则为其地位的重新确定提供了切实的原典材料。如初唐诗人薛元超就是如此,崔融所撰《唐薛元超墓志》的出土为我们了解他对初唐文学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该墓志的记述,我们知道薛元超和上官仪都是引领诗坛潮流的领袖人物,他们都是集政治家与文学家于一身的。他们的文学创作尽管是政治活动下的余事,但仍以其特殊的地位引领了文坛的走向。然而,薛元超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就其不幸来说,他在初唐曾是一位引领文学发展的盟主,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且编辑成集,并传到了邻邦日本,可是留于今天的作品却寥寥可数,以致我们无法知道其作品的个性特征和风格趋向。就其幸运而言,20世纪末期《唐薛元超墓志》的出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薛元超其人,尤其是他的文学成就找到了另一个视角。墓志材料的发掘与存世史料的参证,使我们可以从特定的视角探测薛元超本人的创作经历以及他与文学世家的关系,并可进一步放开眼界,探讨初唐文学发展的具体环境及文坛领袖人物的情况。对《唐薛元超墓志》的研究,也为我们通过出土文献以发掘被埋没的重要文学人物与文学现象打开了一扇窗口,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就诗人经历来说,新出土文献的重要价值就是能够补充传世文献所缺载的事迹,而有些事迹的补充对于考察当时的文学现象具有重要作用。新出土马克庵所撰的《唐王洛客墓志》云:“时有同郡王子安者,文场之宗匠也。力拔今古,气覃诗学,吮其润者,浮天而涸流;闻其风者,搏扶而飏起。君常与其朋游焉。不应州郡宾命,乃同隐于黄颡山谷。后又游白鹿山。每以松壑遁云,樵歌扞月,□行山溜乳精,苏门长啸,有松石意,无宦游情。”^①王子安就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这一隐居的经历却不为人知。我们以前考察唐代诗人隐居的现象,往往重视盛唐以后的风气,当时有不少人由隐居再走入官场,称为“终南捷径”。《唐王洛客墓志》则说明初唐时期,诗人隐居已经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再由王勃的家族来考察,王勃的祖父是隋末大儒文中子王通,隋炀帝征召而称疾不至,退居于龙门,专以著书讲学为业。王勃的叔祖王绩是一位著名的隐逸诗人,贞观中归隐东皋,自号“东皋子”。他们的退隐之地都是龙门的黄颡山^②。王勃又有与本家兄弟王洛客同隐黄颡山谷的经历。因而《唐王洛客墓志》对于研究王氏一族自初唐以后的文学家族传承以及形成的家族共有的风气,都有重要的认识意义。

就思想背景来说,新出土高锴所撰的《唐郑居中墓志》则记述了诗人郑居中由儒入道的传奇过程。志曰:“始为儒家子,耽阅坟史,深奥自得。及长,举进士。与余交最深,每良时静夜,话及所蓄,则曰:‘某年至五十,即闲居不仕矣!言之不已。予常诘之,以为大夫七十而致仕,古有明义。又子路无宿诺,今去五十尚远数十岁,岂可前定耶?泊知杂之岁,将造予庐,中路而右足指痛,顷刻不可安。翌日,予省之,遂不能履地。乃曰:‘某今岁正五十矣,斯痛也,匪偶然欤!岂不尝志某之言?’犹以亚相方委台事,尚欲牵率公家是从,痛终不瘳,以至长告。及赴襄岷,将与余诀。又

① 拓片图版载《书法丛刊》2002年第3期,第84页。黄清发撰有《王洛客墓志考》一文,对王洛客事迹考证甚详,亦关涉其与王勃的交游。载《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375-386页。

② 有关文中子王通和东皋子王绩隐居黄颡山之事,历代史籍和方志多有记载。《永乐大典》卷六八三八“王通”条引《河中县志》:“文中子王通,按家谱,河汾人。今县南三十里,有通化村集贤里,县北五十里龙门山顶有石洞尚存,盖文中子避乱所居之地也。”(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54页)光緒《山西通志》卷三二《山川》:“龙门山,在河津县西三十五里孟门之下……山脊东连华谷,曰紫金山,曰黄颡山。”(《续修四库全书本》第642册,第46页)又引《河津县志》:“黄颡山在县东北三十五里,即文中子、东皋子隐居之处……下流即白牛溪也。上有永兴禅寺,即文中子授经地。由峪口折而东,有石楼,有文中子洞。洞北由佛殿陟石梯而上,又架木为梁。其西有王绩洞。峪外土壤广衍,或曰即东皋也。”(同前,第47页)参以王绩《负苓者传》:“昔者,文中子讲道于白牛之溪,弟子捧书北面,环堂成列。”(《王无功文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页)《游北山赋》自注:“吾兄通,字仲淹,生于隋末,守道不仕。大业中隐居此溪,续孔氏《六经》近百余卷。门人弟子相趋成市,故溪今号王孔子之溪也。”(同前卷一,第5页)王绩又有《题黄颡山壁》诗:“别有青溪道,斜亘碧岩隈。崩榛横古蔓,荒石拥寒苔。野心长寂寞,山迳本幽回。步步攀藤上,朝朝负药来。几看松叶秀,频值菊花开。无人堪作伴,岁晚独悠哉。”(同前卷二,第48页)知黄颡山确为王氏家族文人的隐居之地。

曰:‘某若至五十五六,即却从宦。’今五十四而歿,异哉!公虽反儒服而慕道斯甚,身佩上清箓。自仙冠之徒,以至于岩栖谷隐,炼丹养气者,朝夕游处,无不宗礼。及止足之限,不知为灵仙异人告之耶?为精爽感通自知耶?遍游洞府,欵然而逝。为数极时尽自终耶?为浮丘令威相携耶?瓊囊葬事,请予志墓,谓备知始终,是以铭云。”^{[7]157}中唐诗人白居易在《开成二年三月三日袂洛滨序》中说:“开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价以人和岁稔,将袂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令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前中书舍人郑居中……等一十五人,合宴于舟中。由斗亭,历魏堤,抵津桥,登临溯沿,自晨及暮,簪组交映,歌笑间发,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尽得于今日矣。”^{[8]2298}可见,白居易闲居洛阳时,与郑居中也有所往还。白居易早年志在兼济的儒家思想,到此时也逐渐让位于崇尚逍遥的道家哲学,故而由新出土的《唐郑居中墓志》结合对白居易诗中有关郑居中交往的考察,可为我们研究中唐时期诗人的思想演变背景提供更多思考的余地。

就新出作品来说,可以扭转传世文献所展现的文学分布不平衡的格局。这里列举长沙窑新出土唐诗为例加以说明。长沙窑出土瓷器所题唐诗是继敦煌文献之后发现的唐人题刻唐诗的重要文献,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与文学价值^①。这些诗歌主要题刻在瓷壶的流部之下,也有少部分写在双耳罐腹部、碟心或枕面之上。总共有一百余首唐诗都没有诗题,不著作者,体裁有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其中五言诗占据绝大多数,大概是诗句简短,便于镌刻之故。诗歌通俗浅显,明白流畅,带有民间文学的特点。我们将这些诗与《全唐诗》中文人作品对照,就会发现这些民间诗歌与文人作品还是有紧密联系的。长沙窑瓷器大量唐代题诗的发现,足证当时长沙的诗歌创作也是空前繁荣的。但从传世的文献如《全唐诗》收录的唐诗来看,湖南一带的诗人和诗作是非常少的,除了北方南贬的诗人之外,堪称杰出者唯李群玉一人。这种状况不仅与长安、洛阳的都城诗坛无法比拟,即使与江淮这样地域的诗歌创作也不能相提并论,个中原因都很值得探讨。但无论如何,长沙窑瓷器题诗的发现,为唐代湖南的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也为研究唐诗的地域分布提供了更多的对比空间。

三

吴承学先生曾说:“本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研究主要是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而在古代文学形态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往往未能从实际出发,对中国古代原来非常重要的一些文体形态相当忽视。因为从现在的眼光看,古代许多重要的文体形态是‘非文学’的文体形态,但是在中国古代实用文体形态与文学文体是浑成一体的。因此,我们的古代文学史研究,一定要从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的实际情况出发。”^{[9]2}重视出土文献文体形态的研究,是研究中国文学史从实际出发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从新出土文献中,可以总结出一直被忽视的中古文体形态及其演化的特点。

从南北朝到唐代,文体在沿袭过程当中也不断发生变化,这不仅是某一种文体自身发展的需

① 有关长沙窑瓷器题诗的相关研究有两个方面,一是诗歌校录:傅举有《长沙窑新发现的唐诗》,载《大公报》1985年10月26日;周世荣有《长沙窑唐诗录存》,见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第5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71页;徐俊有《唐五代长沙窑瓷器题诗校证》,见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97页。二是诗歌研究:周世荣有《唐五代长沙窑瓷器题诗概说》,见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第5辑,第72-74页;陈尚君有《长沙窑唐诗书后》,见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第5辑,第75-77页;李建毛有《长沙窑瓷器题诗意蕴索史札记》,载《南方文物》1998年第3期,第96-101页;蒋寅有《读长沙窑瓷器所题唐俗诗录札记》,载《咸宁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第63-66页;吴顺东有《关于长沙窑诗文瓷的几点认识》,载《南方文物》1998年第3期,第96-101页;贺晏然有《唐长沙窑诗文初探》,载《南方文物》2005年第2期,第68-72页。

要,也是多种文体相互渗透的结果。下面以新出土墓志为例,阐述中古时期铭与诗、诗与序、序与铭的融合和分离情况,以及墓志的文体沿革特点。

(一) 铭与诗的结合

曹丕《典论·论文》曰:“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10]127}中国古代重文体之辨,而在创作过程中也出现了部分文体融合渗透的情况,墓志尚实之铭和欲丽之诗融合就是典型的现象。但这种现象我们还没有在魏晋南北朝墓志铭中发现实例,而在唐代墓志中出现者却不止一例。《河洛墓刻拾零》四五二《唐乐映室石诗》:“《唐乐知君自靖人君室石诗并序,自撰》:乐知,自溢也。自靖人,自予也。名映,字韬之。玄晏十七代孙。祖父兄皆二千石。贞元癸酉秋生于蜀。映年七十二,太岁甲申终于洛。十岁而孤,母兄育训;长为儒业,无所成名;壮而纳室,竟无嗣续。因缘从事,仅十五载。邴曼容之贤,禄不过六百石,吾已及之;邓伯道之哲,皇天尚使无儿,何足叹也。依释不佞,奉道不谄,与朋以澹,事长以恭,如斯而已矣。今日幸免毁伤,归全泉下,预于先大夫北廿步,先妣东十三步,兄西十五步,凿深九尺,筑高一寻,旁荫故柏,上植三株,附茔不敢具三代官讳。诗曰:三乐道常,九思不惑。六极幸免,百行惭德。四大无有大患息,一丘乐化永无极。”^{[11]611}这是唐代皇甫映自撰的一篇墓志铭,与普通墓志铭相比,古朴的成分减少,文学的色彩增多,以至于志题称“诗”而不称“志”。就形式上看,前面是散文叙述,后面是韵文概括,虽与普通墓志铭无异,但一般的墓志铭风格古朴,行文规整,写作态度严肃,而这篇墓志铭则幽默诙谐,前面的叙述部分虽用骈文,但行文活跃,颇近于诗序,而后面的铭文也富于变化,近于杂言诗。最后的诗作实际上就是一篇自挽诗,这是挽诗的一种特殊类型,也是晚唐时期诗与志融合的产物。

铭是韵文,诗也是韵文,本身有一定的联系,在唐代诗歌繁盛的时代,其体更易渗透。故韩愈作《楚国夫人墓志铭》言:“用昭厥裔,篆此铭诗”^{[12]卷七,350},则径称铭文为“铭诗”。白居易更是将自己所作之诗用为墓志铭文的一部分。其《江州兴果寺佛大德湊公塔碣铭》云:“及迁化时,予又题一四句诗为别,盖欲会前心,集后缘也,不能改作,因取为铭曰:本结菩提香火社,共嫌烦恼电泡身。不须恋恋从师去,先请西方作主人。”^{[8]卷四一,2702}而这首诗又见《白居易诗集》,题为《兴果上人歿时题此决别兼简二林僧社》^{[8]卷一七,1084}。有时墓志后的铭文既不称“铭”,也不称“诗”,而是称“歌”。如新出土崔拙撰《刘元贞墓志铭》:“歌曰:面松岳兮小有阳,东望溟兮饮太行。夹河洛兮地一藏,奉天劳兮憩北邙。窀穸奄兮不重光,大贤邇兮物感伤。甫奇谷兮三畛强,永为古兮从此张。”^{[13]197}这篇铭文是由一首骚体诗构成,故其称“歌”。故而就铭文发展而言,到了唐代,无论从文体、格式还是韵律上,都受到诗体的影响,以至于有些铭文直接称“铭诗”、“诗”或“歌”。

(二) 序与诗的结合

唐代是诗的国度,因而诗歌是无处不在的,诗人撰写墓志铭时,也会对墓主的诗歌成就加以称道,并甄录一些诗篇。如新出土的《唐张晔墓志》就是如此:

公讳晔,字日章,其先南阳人也……公应进士举,天下知名。著古律诗千余篇,风雅其来,莫之能上,览者靡不师服。于是乎今鄂州观察判官卢端公庠,顷为河南府掾充考试官,公因就试,遂投一轴。卢公谓诸僚友曰:“张子之文,自梁宋已来,未之有也。”复课一诗送公赴举云:“一直照千曲,一雅肃群俗。如君一轴诗,把出奸妖服。”又云:“乃知诗日月,瞳瞳出平地。”又今尚书右司郎中杨戴为淮安太守时,制一叙奖公之文曰:“张氏子用古调诗应进士举,大中十三年余为监察御史,自台幕归,门者执一轴,曰:‘张某文也’。阅于灯下,第二篇云《寄征衣》:‘開箱整霞绮,欲制万里衣。愁剪鸳鸯破,恐为相背飞。’余遂瞿然掩卷,不知所以,为激叹之词。

乃自疚曰:‘余为诗未尝有此一句,中第二纪,为明时御史,张子尚困于尘坩,犹是相校,得无愧于心乎。’”^[14]¹¹⁷⁹

再如新出土崔翹所撰的《唐故陈王府长史崔君(尚)志文》:“俄迁右补阙。会驾幸温泉宫,猎骑张皇,杂以尘雾,君上疏直谏,诏赐帛及彩九十匹。献《温泉诗》,其略曰:‘形胜乾坤造,光辉日月临。愿将涓滴助,长此沃尧心。’帝嘉其旨意,赉杂彩三十匹。时录诗者多,咸称纸贵。补袞之职,非君而谁?”^[15]¹¹⁴ 这也是近年发现的新出土墓志中所载唐诗的全篇之一。

我们知道,唐代文学史是在多种文体不断融合与渗透的基础上发展演变的,尤其在传记和叙事文学中更是如此,诗与传奇的结合,变文中散文与韵文的结合,都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墓志中诗与序的结合,虽然没有前面的文体那样普遍,但也看出唐人在文体渗透方面的努力。不仅如此,墓志之序在叙述事实时,还经常与其他文体如诏诰、制敕等结合。

(三) 序与铭的分离

墓志铭是刻之于石、埋于墓道的实物载体,前半部分为序,后半部分为铭,这两部分通常情况下都是由一位文人撰写的,故而文体风格保持一致。但自南北朝开始,出现了两个作者合撰墓志铭的情况。如《北齐封子绘墓志》称:“从弟孝琰以为陆机之诤士平,情则兄弟;潘岳之哀茂春,事实昆季。是以谨撰遗行,用裁志序。所恨少长悬隔,聚散间之,素业贞猷,百不举一。吏部郎中清河崔瞻与公礼闾申好,州里通家,摘缀之美,籍甚河朔。敬托为铭,式昭不朽。”^[3]⁴²⁴⁻⁴²⁵ 知序文为封孝琰作,铭文为崔瞻作。到了唐代以后,两个作者合作墓志铭的情况更多。如新出土《大唐故黄门侍郎兼修国史赠礼部尚书上柱国扶阳县开国子韦府君(承庆)墓志铭并序》题署:“秘书少监兼修国史兼判刑部侍郎上柱国朝阳县开国子岑羲撰,中书舍人郑愔制铭。”^①《唐故纳言上轻车都尉博昌县开国男韦府君墓志铭》题署:“孤子前朝议大夫行春官员外郎承庆撰序,春官尚书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南阳县开国子范履冰制铭。”^[16]⁷⁶《唐故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赠司空荆州大都督苏文贞公神道碑》题署:“范阳张说撰铭,卢藏用撰序并书。”^[17]^{卷六九·1}《唐故居士钱府君夫人舒氏墓志铭并序》题署:“左威卫胄曹参军广平程休撰序,许州扶沟县尉博陵崔颢撰铭。”^[18]³¹² 因而这些墓志铭的序与铭无论是从体裁还是就作者而言,都是相对独立的。

序与铭关系最为特殊者是 2002 年出土的《唐曹仁墓志》,该志有一序两铭。题署:“河南府进士李渐撰,又铭河(南)府进士张倪,安定胡霏然书。”李渐铭曰:“将军高台兮今已倾,万安之下卜异莹。寒烟漠漠兮晦佳城,日夕悲风兮松柏声。天既长,地复久,泉高不闭兮知何有,终古令名兮传不朽。”张倪又铭曰:“哲人其萎兮逝不还,泉门杳杳兮闭重关。涧水潺潺兮夜声切,丘垅峨峨兮悲转咽。黄壤幽邃兮夜何长,松楸森森兮明月光。委骨埋魂兮万安阳,保君千载兮德逾芳。”^[19] 双铭有两位撰者,是相互独立的,但同一篇墓志的双铭显然又从文体风格的一致上考虑,故虽为二人所撰,其表现形式和蕴涵情感,都是一致的。唯这种形式撰文奇特,构思新颖,在出土墓志与传世文献中都极为罕见。在新出土墓志中,题下未署双铭,而实际为双铭者则时有所见,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还收录了《唐元振墓志》,虽然题下未署双铭,但实际上是双铭的,因为在撰者杨光煦的序和铭后,又有“侄寂重铭曰”一段,重铭者亦是该志的书者^[20]¹⁵⁷⁰。同书收录《唐辅得一墓志》在王頊所撰序和铭之后,又有“河东子泣而铭曰”一段^[20]²¹⁹⁰。还如《唐元振墓志》的重铭:“呜呼季父,直哉惟清。陈力就列,俗政人宁。冀霜台之一迹,何逝川之不停。志诚无应,雷同有声。追慕感切,知犹子

① 墓志拓片图版及录文载于陈忠凯《唐韦承庆及继母王婉两方墓志铭文释读》,见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 7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44 页。

情。”^{[20]1570}这些重铭的形成过程与题下已署双铭者还是有区别的,有些甚至是镌刻墓志时加入的,故而独立性较前者强一些,更契合重铭撰者的身份。

(四) 墓志文体的风格变化

墓志文体风格的动态变化也是墓志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诸如从北朝到唐代,墓志在沿革中风格产生了不少变化,这样就使墓志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内涵渐趋丰富。陆扬先生说:“其实北朝到隋代的墓志的写作风格变化,对于唐代带有公众性意义的文字诸如碑铭之类是有关键影响的,所以,要知道崔融、张说一类唐代的名写手的风格是如何产生的,北朝墓志的文学分析应该可以带来诸多启发。”^{[1]125}再如,吴少微、富嘉谟合撰的《有唐故朝散大夫守汝州长史上柱国安平县开国男赠卫尉少卿崔公(暲)墓志》,为我们研究唐代墓志文体的形态和风格提供了珍贵的个案例证:

初,公皇考洛县府君俨在蜀之岁,公年始登十,而黄门郎齐璇长已倍之,与公同受《春秋》三传于成都讲肆。公日诵数千言,有疑问异旨不能断者,公辄为之辩精,齐氏之子未尝不北面焉。由是博考《五经》,纂乃祖德,则我烈曾凉州刺史大将军说、烈祖银青光禄大夫弘峻之世业也,累学重光,于赫万祚。公尤好老氏《道德》、《金刚》、《般若》,尝诫子监察御史浑、陆浑主簿沔曰:“吾之《诗》、《书》、《礼》、《易》,皆吾先人于吴郡陆德明、鲁国孔颖达,重申讨核,以传于吾,吾亦以授汝,汝能勤而行之,则不坠先训矣。”因修《家记》,著《六官适时论》……公博施周睦,仁被众艰,是以有文昌之拜;大惠不泯,是以有宜阳之歌;守正不回,是以有三途之归,海浙之远。昔十岁执先夫人之丧,十五执先府君之丧。《礼》:“童子不杖。”而公柴病,孝也。尝与博士李玄植善,植无所居,公亦宴陋,办宅与之,义也。性命之辨,人莫之测,而公先之知,命也。^{[20]1802}

此文乃吴、富二人合作,在唐文中属于特例,从合作情况可以看出吴、富二人的密切关系。上面的引文虽还有一些骈文的句子,而总体上已经散化,可见,吴、富二人在文体上的变革,魄力是相当大的。更为重要的是,文中对于儒家经典的提倡,开了中唐韩愈文以载道的先声。他赞扬崔氏“博考《五经》,纂乃祖德”,以陆德明、孔颖达为宗,并著《六官适时论》。这与《旧唐书》称“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相一致。由此可见,墓志文体的变化不仅是文体本身发展的结果,也与政治背景、文化思潮、思想渊源的相互作用密切相关。

四

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背景的研究,只有切实把握文学的背景,才能进一步准确地研究文学现象和文学史发展进程。文学背景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民俗等各个方面。笔者曾在《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中说:“要深入研究唐代文学,弄清文学进程及演变的背景极为重要。而对于背景的理解,仅靠传世文献是不全面的,因为传世文献有不少是经过当事人的篡改,也有在后世流传当中失实的。这就需要通过新出土文献来参证与补充。”^{[21]53}这一基本判断现在看来仍然是正确的,只是近年来的研究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这里我们以玄宗天宝前后为时间断限,以李林甫为关联人物,以出土文献结合传世文献,对盛唐文学的政治背景加以分析。

人们对于唐玄宗朝的历史往往有一种固定的认识:就时间上说,以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代替张九龄为首相为标志作为唐代由盛转衰的分界线;就人物来说,则常以开元中的宰相作为坐标系,以确定研究对象的是非,大多以接近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者为是,以接近李林

甫、杨国忠者为非^①。而这种研究方式和思维模式最易于将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不利于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唐苑咸墓志》的出土使我们得以进一步了解这位盛唐时期复杂的政治人物与文学人物的真实面貌。以苑咸为中心,从其与当时的人物、事件的关联中看待唐代的一些政治问题,并由此观照唐玄宗天宝前后的政治格局,也会对这一时期的文学背景产生新的认识。就传世文献记载,苑咸一直是受李林甫器重的人物,故人们以为“苑咸是一个卖身投靠李林甫的文人”^{[22]127}。而新出土的《唐苑咸墓志》有这样一段话:“公以盛德盛才,加之以政事,论琐劣不逮,邾子之言,敢以颡举。天宝中,有若韦临汝斌、齐太常浣、杨司空绾,数公颇为之名矣,公之与之游,有忘形之深,则德行可知也。每接曲江,论文章体要,亦尝代为之文。洎王维、卢象、崔国辅、郑审,偏相属和,当时文士,望风不暇,则文学可知也。右相李林甫在台座廿馀年,百工称职,四海合同。公尝左右,实有补焉,则政事可知也。”^{[15]158}苑咸是先得到张九龄引荐和任用,后来才受到李林甫器重,而且和当时著名政治家韦斌、齐浣、杨绾,文学家王维、卢象、崔国辅、郑审关系密切,因而就绝不能简单地否定他的人格和才能。由《唐苑咸墓志》,我们对于盛唐时期的政治背景、唐代转型的复杂情况及其与文学的关系,都会产生新的认识。这方面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见拙作《新出土〈苑咸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23]。

再如陈希烈早年得到唐玄宗的恩宠,天宝时期又受到李林甫的眷顾,而安史之乱起,则又投降了安禄山,并被任命为宰相。因而,陈希烈是安史之乱前后重要的政治人物与文学人物。近年来陈希烈墓志的出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其安史之乱前后的事迹和思想提供了新的材料。以《唐陈希烈墓志》为考察对象,并进一步探讨唐代士大夫在安史之乱前后的立身行事,对研究唐代转折时期的政治、文学乃至文化背景,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希烈作为唐代左相兼兵部尚书,历官二十余任,从仕五十年,可载事迹甚多,而其墓志却十分简略,这涉及唐代重大的政治问题,故有待发之覆。新出土《唐陈希烈墓志》言:“太师属元凶放命,大□滔天,剥丧鸿猷,栋折榱坏。不然者,我太师侍讲紫极,清论皇风,则张禹、胡广之俦,曷足为盛!呜呼!使八十之年,遭遇否理,为述何伊,且封且树,略志伊何,或当永固。”^{[24]690}所言之事极为隐晦,盖与重要的历史人物李林甫相关。陈希烈与李林甫关系密切。《旧唐书·陈希烈传》:“玄宗凡有撰述,必经希烈之手。李林甫知上眷待深异,又以和裕易制,乃引为宰相,同知政事,相得甚欢。而林甫居位日久,虽阴谋奸画足以自固,亦希烈佐佑唱和之力也。累迁兼兵部尚书、左相,封颍川郡开国公,宠遇侔于林甫。及林甫死,杨国忠用事,素忌嫉之,乃引韦见素同列,罢希烈知政事,守太子太师。希烈失恩,心颇怏怏。”^{[25]卷九七,3059}《新唐书》将希烈置于《奸臣传》,并云:“林甫颡朝,苟用可专制者,引与共政。以希烈柔易,且帝眷之厚,乃荐之。五载,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左丞相兼兵部尚书,许国公,又兼秘书省图书使,宠与林甫侔。林甫居相位久,其阴谋虽足自固,亦希烈左右焉。杨国忠执政,素忌之,希烈引避,国忠即荐韦见素代相,罢为太子太师。希烈失职,内忽忽无所赖。”^{[26]卷二二三上,6350}又《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天宝十一载(752):“初,李林甫以陈希烈易制,引为相,政事常随林甫左右,晚节遂与林甫为敌,林甫惧。会李献忠叛,林甫乃请解朔方节制,且荐河西节度使安思顺自代;庚子,以思顺为朔方节度使。”^{[27]卷二一六,6912}知陈希烈初依李林甫,后发展到自己专权的地步。高适有《古乐府飞龙曲留上陈左相》诗,称赞陈希烈颇有大德,是天子梦寐以求的贤才。其出为左相,是为苍生而谋。古人只有尹吉甫和张良能与其比拟,而自己即使想高攀也不知路

① 崔群《论开元天宝讽止皇甫嵩疏》云:“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用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全唐文》卷六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739页)这段文字是后人对唐代盛衰认识的始作俑者。建国以后这种观点也是学术界的主流趋势:“以开元二十四年末张九龄因李林甫进谗言而罢相为分界线,盛唐可以分为前后两期。盛唐前期,政治开明、经济繁荣,诗人们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仕途施展才能。盛唐后期,社会危机日甚一日,诗人们仕途坎坷,而诗歌创作却获得丰收。”(丁放、袁行霈《李林甫与盛唐诗坛》,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5期,第47页)

径。自己尚在风尘,而陈希烈已在霄汉,因而只有投诗瞻望,悠悠思念而已。高适又有《上李右相》诗,大致内容与《古乐府飞龙曲留上陈左相》诗相似,前半为颂李之作,后半为自述身世之词。这两首诗都作于天宝八载(749)高适在封丘尉任上。高适投诗于陈希烈和李林甫,当然会有歌功颂德之意,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李林甫、陈希烈等人在玄宗天宝时期并不是乏善可陈的。这样,我们以新出土墓志对其事迹的记载和功过的评价,与史籍记载以及当时人的评述参证,就有助于了解陈希烈的政治进退及与李林甫关系的具体情况,并为唐玄宗天宝时期的文学背景提供另一种思考的空间。

五

对学术研究而言,由新材料的发现与解读引发新问题的产生,进而寻求解决的途径和办法,以促进新的学术领域的开拓,推动一代学术的进步,应该是新世纪学者的使命。出土文献是新材料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最大的价值在于为我们提供了最接近历史原生状态的文本,是文史研究切实可信的实物载体。出土文献中大量的文学史资料与传世文献有着极大的差异,即没有被筛选、诠释,甚至注上加注,层层叠叠地发生变化过,而是保存了千百年以前初始形成的面目。尤其是以石刻为主的出土文献,对于中古文学研究,无疑开拓了新的视野。

首先,这些新文献在扭转区域文学史研究的某些薄弱局面起到了很大作用,甚或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区域文学的空白。这以新出土的北朝墓志与长沙窑瓷器题诗最有代表性:北朝墓志不仅提供了新的文学文本,也为改变南北朝文学研究长期以来不平衡的局面提供了新的思考余地,人们的视野可以由经典名家名作扩展到日常生活。笔者也注意到,传统的金石碑志研究虽然具有很长的历史,但一直是以史学为中心,其次涉及书学和小学,相关的文学研究极为薄弱,甚至留下了很多空白。而实际上,将新出土的墓志作为一种独立性文体进行研究,并以此为中心展开文学史现象和文学史演变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前景。长沙窑瓷器题诗对于唐代文学研究的意义更不容低估,不仅为唐代湖南地域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为研究唐诗的地域分布提供了更多的对比空间。以前的文学史研究往往重视线性的时间梳理,而对于断面的空间发展研讨不足,而这样规模较大的发现对于扭转唐诗研究的区域不平衡局面无疑具有一定的作用。

其次,通过出土文献发掘以前较少注意到的文学史现象。如《唐薛元超墓志》的发现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位初唐诗坛的领袖人物,从而对初唐文学的发展演变也有了新的思考。薛元超是一个被埋没的文坛领袖人物,从墓志中可以看出初唐诗歌的发展与唐代文馆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也与家族的渊源具有一定的联系。而薛元超与上官仪在当时地位的平分秋色,对比后世的极大反差,为研究纸抄时代的文学传播与接受提供了对比的实例。新的文学史料的发掘和新的文学现象的发现,也会加深对文学背景的进一步理解。如唐玄宗后期文学发展的政治背景,人们往往把目光聚焦在李林甫身上,以为诸多著名文学家的坎坷命运都与李林甫执政时的腐败政局相关。但我们对新出土的《唐苑咸墓志》和《唐陈希烈墓志》加以考察,就会对盛唐时期的政治背景、转型时期的复杂情况及其与文学的关系,甚至影响唐代历史进程的安史之乱,具有新的认识。

再次,新出土文献有助于促进文体研究的深入。文学史研究的核心是文体研究,而在中古文学史研究领域,长期以来是重视诗而忽视文,重视经典文学而忽视应用文学,南北朝时期还重视南方文学而忽视北方文学。故而出土文献对于文章学研究的价值不容低估,尤其体现在文体渊源、文体演化和文体渗透等方面。如唐代墓志中诗与序的结合,可以看出唐人在文体渗透方面的努力,墓志之序在叙述事实时,还经常与其他文体如诏诰、制敕等结合。

毋庸讳言,新出土文献也是有很大局限的,首先是出土地点的限制使这些文献表现为零星与散乱的状态;其次是这些文献的出土因受到各种条件限制,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出土文献也存在着精

华与糟粕混杂的情况,有些还需要时间的筛选,才能体现其价值。因此,我们利用出土文献从事文学史研究,就不能局限于出土文献一隅,而应该尽可能广泛地搜集与整理出土文献材料,并与传世文献进行比照参证,在对出土文献文本复原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的社会文化学观照,从而提炼出具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材料进行整合研究,以逐步探讨与揭示文学生成和发展的原生状态,从而逐渐开拓中古文学史研究的新局面。

(本文曾在 2009 年 12 月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文学史学科百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得到多位学者的指教,又根据《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审稿专家的意见加以修改,在此一并致谢。)

[参 考 文 献]

- [1] 陆扬:《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06 年第 4 期,第 95 - 127 页。[Lu Yang, "From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Data of the Epitaph to Its Historical Study: The Case of *Interpretations of the Newly Unearthed Epitaph in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No. 4 (2006), pp. 95 - 127.]
- [2] 罗新、叶炜:《新出汉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Luo Xin & Ye Wei, *Interpretations of the Newly Unearthed Epitaphs in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5.]
- [3]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年。[Zhao Chao, *A Compilation of Han, Wei,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Epitaphs*, Tianjin: Tianjin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8.]
- [4] 王其祎、李举纲:《新出土北周建德二年庾信撰〈宇文显墓志铭〉勘证》,见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 8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250 - 259 页。[Wang Qiyi & Li Jugang, "Amendments of the Newly Unearthed 'Epitaph of Yuwen Xian' Written by Yu Xin in the 2nd Year of Jiande of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in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ed.), *Excavated Documents: Vol. 8*,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7, pp. 250 - 259.]
- [5] 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年。[Luo Feng, *Between the Hus and Hans: The Silk Road and Northwest Historical Archaeolog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2004.]
- [6] 庾信:《庾子山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Yu Xin, *Collected Works of Yu Zish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 [7]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 8 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年。[Wu Gang, *Quan Tangwen Addendum: Vol. 8*, Xi'an: Sanqin Press, 2005.]
- [8]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Zhu Jincheng, *Annotations and Notes of the Bai Juyi's Works*,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8.]
- [9] 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年。[Wu Chengxue,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Styles*, Guangzhou: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0] 萧统编:《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Xiao Tong (ed.), *Wenx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7.]
- [11] 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年。[Zhao Junping & Zhao Wencheng (eds.), *A Compilation of Luoyang Epitaphs*,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ublishing House, 2007.]
- [12] 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Ma Qichang, *Collations and Annotations on Han Changli Corpus*,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6.]
- [13] 吴钢:《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年。[Wu Gang, *Quan Tangwen Addendum: Qiantang Zhizhai Xincang Zhuanji*, Xi'an: Sanqin Press, 2006.]

- [1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千唐志斋藏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of Henan Province & Cultural Relics Bureau of Luoyang City (eds.), *Qiantang Zhizhai Cangzhi*,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1989.]
- [15] 杨作龙、赵水森：《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Yang Zuolong & Zhao Shuisen, *Interpretations of Luoyang Newly Unearthed Epitaphs*,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ublishing House, 2004.]
- [16]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省文物局编：《陕西碑石精华》，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Shan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Shanxi Bureau of Cultural Relics (eds.), *Essence of Shanxi's Tablets and Monuments*, Xi'an, Sanqin Press, 2006.]
- [17] 王昶编：《金石萃编》，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5年。[Wang Chang (ed.), *Jinshi Cuibian*, Beijing: Cathay Bookshop, 1985.]
- [18] 洛阳历史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洛文化论丛》第3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Luoyang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Archaeology (ed.), *Heluo Wenhua Luncong: Vol. 3*, Zhengzhou: Zhongzhou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19] 赵文成编：《唐曹仁墓志》，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1年。[Zhao Wencheng (ed.), *Cao Ren's Epitaph*, Ji'nan, Shandong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1.]
- [20]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Zhou Shaoliang (ed.), *A Compilation of Epitaphs in the Ta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2.]
- [21] 胡可先：《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第47-59页。[Hu Kexian, "Excavated Documents and New View of Tang Literature," *Literature Heritage*, No. 1 (2005), pp. 47-59.]
- [22] 张福庆：《关于王维“趋附”李林甫一说的考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125-128页。[Zhang Fuqing, "The Discussion of Wangwei Succumbing to Li Linfu,"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No. 4 (1999), pp. 125-128.]
- [23] 胡可先：《新出土〈苑咸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57-67页。[Hu Kexian, "Newly Excavated 'Yuan Xian's Epitaph' and Relevant Issues,"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No. 4 (2009), pp. 57-67.]
- [24]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Zhou Shaoliang & Zhao Chao (eds.), *Sequel to A Compilation of Epitaphs in the Ta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1.]
- [25] 刘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Liu Xu, *Jiu Tangs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 [26]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Ouyang Xiu & Song Qi, et al., *Xin Tangs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 [27]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Sima Guang (ed.), *Zizhi Tongj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6.]